

关于中日关系的时空纬度探讨

侯志公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中日关系的冲突不仅源于历史认知问题,还源于全球国家政治利益的博弈,也基于对同源文明的传承方式不同。如何打开中日政治关系僵局已成为 21 世纪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东亚政局的稳定,更是对全球发展的一种国家责任。因此,中日双方应着眼于历史,建立面向未来的正确历史认知观,树立新思维;中日关系的未来应以发展为指归,承担和谐发展与全球责任;文化与文明传承应成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恒久纽带。

[关键词]时间纬度;空间纬度;历史认知;政治博弈;文明传承

[中图分类号] D829 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0)07-0144-04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物质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构成了一切社会活动的经纬。从时空的视角研究国家关系及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文学空间,“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一方面,“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即时间的空间化;另一方面,“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社会关系也是如此,国家关系通过时空展开与时代和历史的对话,对整个民族生存处境进行深思。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就是时间性在国际事件中的淡化,空间性逐渐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技术的双重推动下,种种视像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形成日新月异的流动景观,使人们应接不暇;事件与事件、图象与图象之间缺乏内在的关联,国际活动仿佛失去了时间的连续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种空间性现实从三个层面展现出来:全球政治关系的博弈、历史问题在当代关系的影响、文化软实力在国民精神方面的渗透与植入等。

一、中日关系发展的时间纬度分析

历史,我们总难以忘却。而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对于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记忆方式。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保存了其固有的事实。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跨越时空。今天我们回顾两千多年来的中日交往史,发现空间性现实对时间的覆盖——日本在故意地忘却;中国在本能地忆起。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

的,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¹所谓中日关系的时间纬度,即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在多长时间达到或初步达到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考察从古代到现代的中日关系,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欺凌弱者”的行事方式,使得现在的中日关系不得不带着历史的痕迹在曲折中发展。事实上,中日关系的演化过程是在国际事务中复杂的线性的多事项时间的累加,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实力较量的一个结果。

1 中日地缘政治的历史性障碍,使得日本对中国的有浓重的“历史情结”

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在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和冲动。日本的遣唐使虽被我们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行为看,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目的是超越中国。中日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自 20 世纪初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本土被美国占领,国家军事机器被摧毁后,才换来今天表面上的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局面。二战后日本借助美国国力得到恢复,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日本感到类似晚清和抗战前中国处于内乱的

[作者简介]侯志公(1969-),男,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22、123 页。

历史机遇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将历史性地崛起,并有极大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袖国家。而日本除了经济上的大国地位外,外交、军事仍在美国的羽翼下蝇营狗苟,内心日益感到不安,日本的“历史情结”被再次激活了。面对日本这种“历史情结”,一味容忍、宽恕、友谊、退让对中国来说不是善策,不可能带来长久安宁。《论语·宪问》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而是主张以公正为原则对待别人的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怨恨,我们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也应如此。

2 日本历史形成的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使中日关系呈现不对等的交往模式,形成日本对中国的几种态度——称臣、对等、欺凌、竞争合作等

据历史记载,除了强悍的蒙古统一中原时期外,历史上的日本一直以对中国为主的大陆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居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守势。汉族执掌中原政权时,一味息事宁人,从未给予日本的嚣张以主动、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历史性的迁就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性蔑视,使日本养成了长期骄横无理和在内心蔑视中国的习惯。尤其在明代,对中国想和就和,想打就打,想贸易就贸易,想抢劫就抢劫,中国则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历史中的中日交往前后分为以下几种性质。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时期,那时日本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推古天皇 15 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第二次出使隋时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从此时,日本对中国开始转换身份,不间断地与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纳贡不惜同忽烈对抗。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逐渐产生了要鲸吞中国、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历史记载着日本的野心:1894 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4 年发动日俄战争;1910 年并吞朝鲜;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进驻日本。从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建交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的增强,日本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往逐步频繁。尤其是 90 年代后的政冷经热,充分说明了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合作态度在逐步加强。

3 中日交往历史进程中的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借力打力。日本尚未统一时,借助中国的强势为本土斗争增加砝码。据史料记载,邪马台女王遣使朝贡魏国,是为了在国内增强政治势力。日本大和朝廷为了在朝鲜同高句丽、新罗、百济周旋,保住那块地盘而与中国通好并引入佛教,这是借助中国在朝鲜进行扩张。国力衰退则对外和

平相处;一旦国内统一,势力增强,则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暴力扩张。在对华侵略、暴力扩张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顾忌和道义上的障碍。第二,恃强凌弱。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势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如美日同盟;如果实力不够强大,或者实力得不到验证,日本也是敢于向你挑战的,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第三,军事至上。历史上的日本是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家,特别崇拜武力,重视军事力量。由于历史上长期内战分裂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崇尚和迷信武力有着久远的传统。日本的工业化起步并非走的是西方商业化的路子,而是从全力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开始的。日本的现代化是以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作为前提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是中日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础,是保证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先决条件。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已经凸显了某种规律:中日“友好”或和平相处须以白江村海战、露梁海战、抗日战争的胜利等为先决条件。这是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长期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换言之,没有国防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就很难同日本打交道。

二、中日关系发展的空间纬度分析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时间的纬度中显现,而发展中的曲折性则是空间纬度的反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日关系的发展常常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左右。这一问题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日关系发展要受到全球政治大格局的影响,发展前景不会有大的波折,但现实问题会诱发两国关系曲折发展。其二是基于历史认知的问题,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肯承认错误,还一贯歪曲历史的做法,会使得今后的中日关系无法打开历史的矛盾点,使中日关系扑朔迷离。其三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同质性是两国未来友好交往的基础,但日本文化的杂糅性使中日交往思维呈现文化差异,从而使得摩擦中有友好。

1 全球政治关系的制衡与利益博弈使中日关系曲折发展。在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中,在分析研究中日政治、安全关系问题时,离不开美国因素及台湾问题。目前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和不断强化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与正在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日本相互利用、相互借重、妄图一同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最终共同称霸东亚的产物。日美同盟不断强化是日本在政治经济困境下外交战略贫困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两手”策略,实现该地区有利于美国利益“制衡机制”的重要体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十年”,而日本所在的地缘气候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印经济发展,使东亚地缘力量对比进一步均衡化,对于非常倚重经济实力来推动国家对外战略的日本来说,这些变化大大削弱了它在东亚格局中的影响力。面对国际政局的变化,日本有意识加强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活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升自卫队级别等。归根结底,维持中

日“斗而不破”才最为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也希望通过加强日美同盟,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可以说,中日合作推动东亚合作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另外,中日之间的台湾博弈始于台湾独特的政治价值。日本之所以支持台湾独立,是因为,假如台湾独立了,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关系,日本将代替美国,成为台湾的宗主国。一切与台湾有关的利益都将归于日本之手,再也没有钓鱼岛之争,台湾海峡将成为遏制中国的一道防线。中国的利益则相反,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台湾能与大陆顺利实现统一,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总的清算,中美之间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将消除。全球化进程日益发展和深入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来说,稀释和溶解日美同盟消极影响,积极有效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就是,不断扩大中美和中日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发展和建立各种类型、各种规模和各种层次的多边或双边战略对话,逐步形成互信基础上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机制。

2 中日交往中的“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成为阻碍中日交往的历史障碍。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无赖态度是中日关系有永远解不开的疙瘩。第一,历史教科书问题。近年来,一些日本出版社美化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回避日军慰安妇问题,将侵略战争美化为日本的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战争。目前已有日本大约 30 多所私立学校采用这些问题教科书。日本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暧昧,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采取“不进行政治干预的方针”,对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予以放行,认为教科书并不代表“日本官方”的历史观点。日本这种纵容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随时可能演化成两国之间严重的政治事件。第二,慰安妇问题。二战期间,日本军方下令为前线官兵设立慰安所,有组织地强征“慰安妇”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涉及中国、朝鲜、韩国、东南亚许多国家,对此,日本官方态度不明朗,要么不承认;要么承认有,但辩解是商业行为,没人强迫;或者说是非政府和军队行为,为民间劳军行动。事实上,慰安妇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历史事实,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历史实行“三不政策”——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使其复杂化。第三,钓鱼岛问题。此问题是中日两国重建近代亚洲史的一个较量。自 1990 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两国的正常竞争关系使日本开始另眼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是二战问题乃至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的一个延伸和证明,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第四,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里面供奉有东条英机等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和共约 2000 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和聚会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伤害二

战受害民众的重大政治事件,已成为日本和亚洲受害国之间的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焦点问题。以上这些空间性的现实问题,都构成了中日交往的羁绊。

3 软实力的较量使中日关系发展曲折中隐含发展机遇。

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外在的表现形式则是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文化全球化作为一个结果和文化领域的反应,是一次深刻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全球性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重组。一方面,由于文化霸权主义的消极影响,日本将其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作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推销,侵蚀着我国的本土文化,使全球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创造着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增加了文化发展中的“异质性”因子。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都必然导致对地域性意识和本土属性的普遍抽象,使在时间中累积起来的地域性文化——一种持续性的精神面临意义(价值)崩溃的危机。保罗·利科尔(P. Ricoeur)指出:“这个是一个事实:任何文化都不能承受和同化现代文明的震动。”¹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传播的代言者,对一国文化的安全有着潜在的影响。中日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步性对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使得中日文化领域的交往日趋复杂化,从而激活了中日关系之间的摩擦。日本的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动画产业在世界动画领域成了领头羊。有些专家认为,现代的儿童接触很多引进的动画片,洋动画给予他们的皆是它国的表达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征,这可能会影响儿童对本土文化的接纳,弱化民族精神。因此,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对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有着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面向全体民众,让全民参与。从这层意义上讲,中日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为认同,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三、中日关系发展趋向的结论

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仍然会带有历史的某些痕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今后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前景:多极对抗体系、多元共存体系、多元一体体系。无论今后的国际格局是哪一种体系,中日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一体,二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转换。从这层意义上讲,审视目前的中日关系,对预测未来的世界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等因素来看,未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必要条件是:一是中国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二是中国能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中国能够与美国在竞争中达成谅解。但这将是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1 中日关系发展的具体定位: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知

对日本而言,正确、诚实的历史认知是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的前提。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破解矛盾

¹ P.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77.

的关键在于日本领导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华历史问题。日本前首相福田,曾用“温故创新”暗喻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中日两国应重温过去几十年乃至百年至上千年的双边交流史,开创富有创意的、着眼于未来的新型双边关系,构建在历史性思维又不囿于此的前瞻性思维。“温故”不仅仅是记住历史教训,而在于如何把历史教训转化为两国发展“创新”关系的原动力。现在,中日突然面临同时强大的现实,急需在相互认知方面改变不正常状态,才能尽早找到两国“稳定的平衡”的支点。正视历史还是忘却历史,还是歪曲历史,还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将是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未来健康发展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逐步深化对日本现状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选择对日策略。日本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基本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之路,不仅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其政治上崛起的诉求中国需要理性正视。如何评估这一进程的影响,以及包括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扩张、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作用等,均需加以深入全面地研究,并由此积极推动民众对日本的再认识。而对于日本来说,也急需摆脱历史情结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理性客观地评估研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走势,并学会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认真对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变化。中日两国都应充分铭记并吸取两国关系史上的教训,切不可让官方和政治关系持续前进的温暖氛围打消了反思历史的勇气,更不可让其阻滞了相互深入全面再认识的步伐;相反,应该借助于这一宝贵时机,从容推进这一关涉两国关系大局和未来的必经进程¹。

2 中日关系的未来以发展为指归: 和谐发展与全球责任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进行对话。我们希望未来的国际体系是多元一体的,这种体系是多元共存体系的延伸,它将摆脱单极独霸、两极或多极争霸的不和谐模式,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前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到亚洲在全球格局的地位,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共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价值不仅仅在于在亚洲称雄,更多的是对全球的责任。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责任将使得中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接触。日本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也是中国希望与之维护友好关系的实力最强的邻居。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国的崛起对他们并不是个威胁。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近年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关系。日本因此也急于表明,它并不把中国当作是威胁,而是机遇,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在 21 世纪,亚太地区

将以 APEC 为主体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多元化与网络化,实现开放的地区合作,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体构成多元化、网络化的地区政治、安全协调机制,最终形成东亚安全共同体²。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合作将成为重要的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首脑于 2008 年 12 月 13 日,在日本福冈县举行峰会后签署三国伙伴联合声明,誓言要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如果中日两个国家合作得不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合作得好,就能产生超过两个国家之和的力量。如何突破“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鼾睡”之类的旧思维,需要中日两国领导人充分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拿出一种新思维,而这种富有创意的中日关系新思维,确实是维系东亚安全与稳定所不可或缺的。

3 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恒久纽带: 文化与文明传承

中日文化交往的历史成为开启未来两国新型关系的钥匙。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狭义文化看,包含哲学、文学、史学、科学、教育、音乐、民俗等领域;从广义文化看,中日文化交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³。特别是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的传奇一生,他把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人民称鉴真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充分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崇敬、膜拜的感情。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特性是固有的,我们始终相信,中日关系会在文化基因的滋养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¹ 张智新:《中日相互再认识仍需加强》,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4/sino_jp080212_shtm1

²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1页。

³ 刘达临:《浮世与春梦》,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页。